

西北军政委员会对新中国初期 西北畜牧业的经略^{*}

李晓英 吴 斌

内容提要:新中国初期,面对西北畜牧业的衰败景象,西北军政委员会在遵循中央“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的政策指示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的措施。西北军政委员会积极建设和施政,不仅为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改善了牧区各族人民生活;在改进牧业生产条件、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为民族团结、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北军政委员会 新中国初期 西北畜牧业

1949年12月底,西北全境解放。1950年1月19日,在原陕甘宁边区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在中央与省之间设立的大行政区,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领导,面对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残破景象,如何因地制宜地对西北地区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无疑是摆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面前的迫切任务。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畜牧业经济则是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初期,无论是担负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还是后来的代理主席习仲勋,都有着多年经略西北的经验,他们对西北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基础有着明确的认识。早在1950年1月26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彭德怀就明确提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甘、宁、青、新等省,牲畜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为此,必须注意培养兽医干部;在牧畜区应有重点的设置兽医站及巡回防疫队等,并积极进行改良畜种”。^①同年3月,在习仲勋的建议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成立,此后各省市县都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在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②从1950年1月成立到1953年撤销的3年多的时间里,西北军政委员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同时也为增强民族团结、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前西北畜牧业发展概况

土地广袤的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有辽阔肥沃的草原,草原上成千上万的牛羊群,还有满山遍野的驴马,成群结队蜿蜒几百公尺长的骆驼队,这些,都是西北人民的主

[作者简介] 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730070,邮箱:lxiaoying@126.com;吴斌,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兰州,73007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商人与近代甘宁青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16BZS120)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彭德怀主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西安: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1950年版,第4页。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要生产动力和重要的财富。”^①据统计,“西北五省土地总面积为五十亿零九千三百四十余万亩,其中已耕地一亿一千八百一十余万亩,拟耕地一亿七千余万亩,牧地及不毛之地二十八亿九千二百八十余万亩。但所有拟耕地者绝大部分是山坡、盐地、旱地、沙质地等,开垦后害多利少,是特别易牧的土地,所以牧地近于三十亿亩,占总面积五分之三。”^②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40%。^③新疆、青海、甘肃各省,许多民族地区就是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的,青海省牧区面积占该省土地的9/10。

西北各地除广大的牧区外,在农耕地区,以畜牧为主要副业的情形也很普遍。西北各种牲畜中,以绵羊为最重要,“战前常年的羊毛产量约为五十万担,占到我国羊毛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除绵羊外,山羊、牛、牦牛、马、驴、骆驼、和猪等的数目也很大,陕西的秦川牛和关中驴,新疆的焉耆马和青海的乔科马都是良种,秦岭山区和大巴山区每年繁殖大量耕牛,供应我国北方省役畜之需。总计西北地区每年出产各种皮达四五百万张之多。”^④

解放前,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直接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有,满、维、回、藏、哈、蒙、塔、土等将近20个少数民族,“人口将近七百万,约占全西北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⑤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西北地区畜牧业产品的掠夺,加之“国内各反动统治的长期压迫、掠夺,又加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给牧区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使畜牧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⑥

甘肃南草原的托赖在清末民初时,有牲畜35万多头(只),是祁连山中部重要畜产品交易中心,酒泉商人曾在此建立所谓“十大公庄”。1932年被马步芳部占据后,敲诈勒索,牧民无法生活,逐渐离开。至1946年,马步芳全部霸占了托赖东部草原,成立了官办牧场。八字墩草原是裕固族重要牧区,1928年设立青海省后,马步芳即派大批军队进入了二寺滩、扎麻什克一带开垦,裕固族牧民被迫远离。皇城滩草原是河西著名草原之一,向来为藏族及少数民族放牧,1929年被马步芳部侵占后,成立畜牧公司,藏民四处流离。^⑦1937年,新疆的阿勒泰、巴里坤的哈萨克族人民,因受不了杂税压榨,5000多户人家(约有3万多人)驮着“哈萨克围”(哈萨克人住的帐篷)逃入青海,受马步芳的剥削,不但被抢去了牛羊和家产,年轻人还被抓去做苦工,10多年来在青海过着流亡的生活。至1949年青海解放时,境内的哈萨克族只剩下5000多人。^⑧在青海玉树藏族地区,光是1941年就被马步芳抢走各种牲畜22万头以上。^⑨

为控制西北的畜牧生产,西北地区各级官僚曾在牧区设有诸多商业贸易公司,新疆有“新疆土产公司”,甘肃有“甘肃省企业公司”和“富宁企业公司”,青海省有“湟中实业公司”,等等。这些官僚资本的商业网络遍布牧区大小城镇,在“统购”与“官价”的名义下,垄断着牧区畜牧业产品,他们以低价收购畜产品和土特产品,然后高价出售工业品和粮食。青海省“德兴海”,即马步芳开设的“湟中实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常常以10块银元的“官价”收购100斤羊毛,转手之后以70块银元,甚至更高的价格出卖。甘肃巴音浩特(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所产驼毛抗战前每百斤为100银元,解放前夕在“宁夏企业公司”的垄断下,降为5块银元,牧民的交易可谓“满驮进城手提回,去时流汗归来寒”。垄断贸易使牧区许多可以畅销国内外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销售滞塞,造成了牧区“羊毛不剪”“羊肠喂

① 何骅:《解放后的西北畜牧业》,《畜牧与兽医》1951年第5期。

② 赵增荣:《西北草原破坏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北农林》1950年第1期。

③ 何骅:《解放后的西北畜牧业》,《畜牧与兽医》1951年第5期。

④ 芮乔松:《祖国的大西北》,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3—54页。

⑤ 《西北目前民族工作情况和任务——汪峰主任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甘肃政报》1950年第4期。

⑥ 青沙:《我国少数民族建设的新成就》,《经济周报》1954年第27期。

⑦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中国民族问题·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第4辑《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第47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

⑧ 柳超:《西北畜牧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

⑨ 芮乔松:《祖国的大西北》,第30页。

狗”的景况。每逢羊换毛的时候,眼看着雪白的羊毛飞散在草丛里。^①

在这些人为的摧残下,西北畜牧业日趋衰落。据《临泽县志》记载:1937年归临泽管辖的地区曾有大小牲畜20余万头,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只剩下绵羊43032只,山羊27738只,牛6790头,马1738匹,驴1457头,骆驼1332峰,骡35头。1949年青海省解放时,大小牲畜比1937年减少了50%,羊只减少30%以上。据青海畜牧厅的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全省牲畜总数曾达到12381000头只的最高记录,以后便连年下降,至1949年青海解放时,总头数便只剩下7487320头只了,比1937年降低38.7%,比清朝末年的7533280头只也减少了。”^②陕西省兴平、武功一带的牛、骡、马和蒲城、富平一带的羊也都衰落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大吉来(青海左翼蒙古的一个旗),解放前20年的时候,有1000多顶帐篷,最差的人家也有200—300只羊、30—40头牛、10来匹马上、几峰骆驼。解放时只剩下136顶帐篷。全旗只有14峰骆驼、20匹马,即便是王爷,全区最富的人,也只有120只羊。原宁夏阿拉善旗解放前10年的时候,有马5万匹、骆驼15万峰,解放时全旗只剩下3000匹马和5万多峰骆驼。新疆阿勒泰牧区,1939年有大小牲畜110万头,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25万头了。^③

畜牧业的衰落,使广大的牧区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很多人一年到头吃不到粮食,甚至连牛羊肉都吃不上,有些王爷、千户连糌粑和雪奇台(乳酪和牛血混合在一起的酪浆)都很少有的吃。边远地方的牧民吃的是自己猎获的野牲畜,以各种野草作副食品,不认识什么是粮食,“青海通天河南念木错的一个二十多岁的藏族青年认为煮熟的大米是蛆,说挂面是虫,尝都不敢尝”。^④“乡村无青年,市集无人烟”正是当时西北牧区人民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显然,新中国初期西北的畜牧业已是残破不堪,留给新生政权的只是一个烂摊子,这一切都给新中国初期西北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

二、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展畜牧业的举措

新中国初期的西北,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新旧政权交替,新区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多存疑虑,宰杀牲畜和隐匿家资时有发生,部分地主因惧怕土改,也纷纷分散畜群,大吃大喝。为消除牧主的疑虑,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4条“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在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的政策,并为他们供应优良种畜,发展畜牧生产。在土地改革地区,对于兼营畜牧业的地主,“也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对其经营的畜牧业,不论畜群大小和种类,则一律不动。对于没收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畜群,也有政府集体经营或与牧民合作放牧,一概不许分散,使其获得更加可能发展的前途。”^⑤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一系列积极政策鼓励和推动下,广大牧区人民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和硕县三区牧主查汗,挖出在地下埋了多年的三十两黄金,买了五百八十八只羊投入生产”。^⑥很多牧主后悔说:“过去不了解政府政策,不该杀的也杀了,不该卖的也卖了,今天明白了要好好管理牲畜”。^⑦而对没有生产资料的牧民,西北军政委员会则要求各省发放贷款,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以帮助当地发展畜牧业生产。“新疆省人民银行先后发放畜牧贷款三百七十多亿元。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成

①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21—22页。

②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畜牧厅编印:《青海省畜牧业经济发展史》,1980年印刷,第85页。

③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28—29页。

④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30页。

⑤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西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1—72页。

⑥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38页。

⑦ 吐娜主编:《民国新疆焉耆地区蒙古族档案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立后的十个月中,人民银行就发放了贷款六十四亿四千多万元”。^①

除稳定牧民生产情绪、发放贷款之外,西北军政委员会还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②控制疾病、管理草原、储备草冬、改良畜种、拓展贸易、保畜增殖、发展水利等多方面措施来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截止1951年底,西北役畜已较1950年增加了13.3%,超过1937年战前水平的1.83%。^③

(一)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主动调节民族内部纠纷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分散杂居,经常因草场、地界、水利、债务等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有的存在了四五十年,有的常达百年之久,长期演变为互相械斗,人畜死亡无数。甘肃夏河县的甘加和同仁县的加吾是山水相连的两个世代都以牧业为生的藏族部落,牛羊和草山牧场是其主要生产资料。大约从清朝乾隆年间起,双方为争夺长约15公里、宽2.5公里多的赛钦沟交界草山,展开武力争斗。此后,相互明抢暗盗牲畜,强力占有草场,械斗仇杀事件屡屡发生,连年不断。仅从清朝末年起至解放前的40多年中,大械斗就发生过5次,双方群众死伤78人,损失牛羊达1万多头(匹、只)。^④甘、青、新三省边境散居着的蒙、藏、哈萨克等族人民,“由于历年械斗而损失的牲畜在二百万头以上,其他财产损失更难以估计”。^⑤为解决这些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指示,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蒙族聚居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肃北地区,藏族聚居的夏河、卓尼、天祝、武坪,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均已先后分别建立的区域自治政权,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管理自己民族的事务。更多的地方(如甘、青、宁三省许多回民聚居的区、乡甚至县以及新疆维、哈等族聚居地),虽然没有宣布区域自治,但实际上也已由本民族干部,负责管理自己民族的事情。”^⑥

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民族事务,对各民族之间的纠纷予以调解。到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仅在青海一省就调解解决纠纷达3000多件。^⑦而“藏族内部加吾部落与甘加部落的草山纠纷,甘肃永昌县沙沟寺藏民与青海湟源县皇城滩回民间的牧户土地纠纷,新疆莎车与泽普、麦盖提与叶城的水利纠纷,昌吉汉族与哈族的牧场纠纷”基本都得到了解决。^⑧这些纠纷的解决不仅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的威信、加强了各民族内部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牧业区各民族人民发展畜牧生产的障碍。

(二) 防止疫病蔓延,健全畜牧机构

解放前,西北各地畜疫流行,仅青海地区各种牲畜传染病就达58种,侵袭病140种。^⑨各种兽疫是造成牲畜“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又以口蹄疫传播最广。

1950年秋天新疆莎车区发生了口蹄疫,为时不久,即蔓延到喀什、和阗、阿克苏、焉耆、伊犁、迪化等区,青海的化隆、乐都、都兰、湟源、湟源、贵德、互助、兴海、同仁等9县。陕西的蒲城、咸阳、渭南、临潼、凤翔、安塞、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醴泉、定边12县,宁夏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中卫县以外,其余磴口、惠农、陶乐、贺兰、永宁、灵武、宁朔、金积、中宁、同心、盐池等11县,也相继发生。^⑩

①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42页。

② 内蒙古解放之后,中共于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并将5月1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日。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将其写入《共同纲领》。根据《共同纲领》的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北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中央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③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71页。

④ 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1921.7—2003.7)》,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⑤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25页。

⑥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西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3—54页。

⑦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北京: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第32页。

⑧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第54页。

⑨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畜牧厅编:《青海省畜牧业经济发展史》,第82页。

⑩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68—0001。

鉴于口蹄疫在西北地区时常暴发,在习仲勋的提议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决定于1951年秋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由贾拓夫任主任委员,霍子乐、张中、盛彤生为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全西北的口蹄疫防治工作。各省设分会,以省主席或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以县长或副县长为主任委员,受分会直接领导。各级委员会委员,以当地有关部门首长、民族代表、民主人士及高级技术人员担任之。^①

除口蹄疫外,各种寄生虫也常常危害牲畜健康,“1950年甘肃省的皇城滩沙沟寺、煤洞沟等地,1951年在宁夏的盐池、平罗、惠农等地,青海省都兰三角城等地,羊只因患寄生虫病死的约占原有羊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六,仅宁夏一省1951年春就因寄生虫死去大羊十万多只,小羊十八万六千多只”。^②

为解决牲畜的各种疫情,西北军政委员会在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的同时,又调整增设了大小畜牧兽医机构127个。这些兽医机构的设立,对预防各种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0年,仅甘肃省就对62万头牲畜进行了疫情的预防。^③1951年,各畜牧兽医机构共生产各种疫苗148万CC,各种血清239万CC,预防注射牛瘟、炭疽、气肿疽,治疗检查各种病畜1929400余头。至1952年,新疆治疗及预防注射各种牲畜217万余头。青海省牧业区防治各种牲畜60余万头。^④

(三) 保护草原,分区轮牧,延迟放牧

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由于人为的乱垦滥牧、过渡采伐,致使草原面积逐渐减少、沙漠扩大。陕西榆林城为明代中叶所建,至民国时期不过400余年,但“已穴中沙中矣,沙漠南侵二百七十八里,”榆林、府谷、横山、神木、靖边等县沙没良田,年在200万亩以上,草地淹没更难计数。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宁夏调查组发现,“宁夏阿旌东北隅,自三盛公以南至四坝区,长约百余里,包括沙金套海、巴音套海、芒兰素怀及磴口等巴格东部农田灌溉区,居民三万余人,所需燃料,全取之于农区以西沙漠边缘的草木,如白刺、多青、珍珠、沙蒿、岌岌等畜食灌木和草类,连根掘出充作燃料。”宁夏金积县南大滩,南北长100余里,东西宽(孙家滩至滚泉)70余里,面积约七八千亩,大部为沙质壤土,间有盐土部分,为一丰美草原,因干旱不能耕种,当地人民每遇雨水丰沛之年,垦地播种,收获尚相当丰富,唯此种机会十不及一,但垦后废弃之地,无草可牧,影响畜牧非常严重。^⑤

为保护草原,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严禁烧草山、挖草皮、盲目开荒等破坏草原的行为,对沙漠边缘防风固沙的草原积极保护,防止破坏份子借口割草而破坏,并教育群众在秋末冬初将老弱及没有繁殖价值的牲畜进行或屠宰食肉,耕畜呈报当地行政核准。以免冬春乏死及减少饲草的消耗。^⑥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调查时,宁夏省阿拉善旗蒙古族牧民就反映:“沙金套海及哈鲁纳等巴格之驼群,移牧于吉兰太巴格者,因惯食卤柴,骤啜食索夕多,常醉卧数日不起,逐渐消瘦或生急性膨胀而死”。^⑦鉴于不合理放牧制度造成草场退化及轮牧过程中发生牲畜因不服水土而死亡的问题,1951年春,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号召各地区划界管理草原,延迟放牧,以恢复草场承载能力。同年9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又组织甘、宁、青3个工作督导组,奔赴各地指导各省具体推行,以引起广大牧民对分区轮牧的重视。青海贵德县藏族都秀部落,“把六十七万五千亩草原划出四季草场,而且从各季草场中心,再分割出四块到六块小草场,把牛、马、羊分群轮流放牧”。^⑧宁夏省根据1951年在盐

①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68—0001。

②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关于防止羊只死亡办法》,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1—0009—0010。

③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第33—34页。

④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46页。

⑤ 赵增荣:《西北草原破坏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北农林》1950年第1期。

⑥ 《开展群众性储草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52—0015。

⑦ 赵增荣:《西北草原破坏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北农林》1950年第1期。

⑧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42页。

池县石头梁子村划管草原的经验,到1952年,9个县1个旗共划管了86块,面积达10885平方华里。甘肃省提倡“封滩育草、延迟放牧”,在肃北自治区和金塔县封闭草滩4块,面积13100平方华里。^①

(四)发动群众储草备冬,种植牧草

长期以来,由于西北广大牧民对储草备料多不重视,所以常常会导致冬春季节牲畜因缺乏草料饿死。1950年冬至翌年春,仅甘肃酒泉专区各县就饿死“大家畜八千八百余头,羊两万余只,最低估计约损失人民币七十余万元。”^②

1951年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发出了《关于夏季生产指示》和《开展群众性储草指示》,该指示为纠正西北地区一些群众“哪年不饿死几个牲畜”的落后思想,号召在“畜牧区收割伏草以备冬季饲料”,在“农作区发动群众贮留各种秸秆、收割野草作为饲料,可试行窑藏青玉黍秸秆,高粱秆作为青贮料”。^③在这一号召下,“青海省大通县元朔乡发动群众节省了蒿秆、麦秸二百四十七万斤,又以副业收入购买冬草约一百万斤,解决了该乡牲畜全年所需的饲料”。^④新疆省的镇西县在县委书记亲自领导下,4天之内割草450余万斤;伊犁、塔城、阿山、焉耆、和田等地,合计储草达9亿多斤,解决越冬期间所需饲料的3/4。甘肃省酒泉70%的牧民都储备了冬草;永登县畜牧劳模高明天在镇武、连城两区,组织了27个割草组,割野草12万多斤。青海省循化、湟源县,储草900万斤。陕西省洛南县农民也储草150万斤,平均每头牲畜有冬草110斤。宁夏省更是普遍组织打草小组,共储草13058000多斤,储料3348000多斤,该省1951—1952年春因乏饿而死的羊仅及前一年的0.65%,储备冬草是主要的因素之一。^⑤

对那些草料不足而牲畜过多的地区,则令有计划地将牲畜转移到有水草的地区放牧、饲养。各级农牧机构协同合作社、畜业公司、人民银行发放饲料贷款解决饲料不足问题。对于气候条件较好、秋季能播种苜蓿及其他豆类作物的地区,西北军政委员会则号召进行种植,以解决草料困难的问题。甘肃“武都、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区,发动群众种植秋苜蓿,在土地较宽的地区,每头大家畜种植苜蓿一亩半以上,每百只羊种苜蓿十亩”。^⑥驻扎新疆的部队则采用苏联牧草田轮作的先进经验,大量栽种牧草。据1952年统计,牧草面积已有33万亩,不仅供给了畜群的饲料,而且逐渐由游牧走向定牧,由分散经营达到集中经营。^⑦

(五)改良品种,提高牲畜品质

西北地区绵羊虽占全国绵羊总数的60%,但产毛量平均每只仅1公斤,一般毛质最多只能纺纱12支。^⑧为了促进绵羊育种工作,提高绵羊品质。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举办了绵羊育种讲习会,抽调西北各地国营种羊场场长、绵羊人工授精技术干部等33人集中学习。讲习期间,由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特请苏联畜牧专家特洛伊茨基去讲习会讲课。^⑨到1950年,经过短短一年的努力,畜牧改进工作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兰哈羊”由“哈萨克”母羊和苏联的“兰布巴里细毛公羊”经试验育成,产毛量由2斤增加到8斤。^⑩

除此之外,西北畜牧部还积极设立配种站,大量购置配种器材,重点筹设推广站、推广组和配种队,对地方上具有经验的民樁,进行思想改造,打破民樁“秘法不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行会思想,使民樁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互相交流,以提高配种工作效率。^⑪到1952年,陕、宁、青省和甘肃酒

①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② 《开展群众性储草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52—0015。

③ 《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贮草通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1—0009—0003。

④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⑤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⑥ 《开展群众性储草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52—0015。

⑦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19页。

⑧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⑨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举办绵羊育种讲习会》,《新华社新闻稿》1952年第925—955期。

⑩ 何骅:《解放后的西北畜牧业》,《畜牧与兽医》1950年第2期。

⑪ 《为召开民樁座谈会由》,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1—0009—0004。民樁即当地牲畜配种人员。

泉等6县,共辅导民樁1877户,配种67163头(甘肃未计)。结合良种推广,宁夏省和甘肃酒泉专区选留了民有优良种畜12566头,约配种188400余头。^①对不合格的公畜,则予以淘汰,“甘肃的酒泉县,以村为单位,平均每五十头母畜选出公畜一头,经检查合格后,发给种畜证,同时选出有配种经验者为家畜保育员(即民樁),凡经检查不合格的公畜,一律予以去势”。^②仅“宁夏一省,就阉割劣种公畜一万四千三百六十六头,羊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二只”。^③

(六)保畜增殖,打击野兽

解放前,西北地区每年因野兽袭击而死的牲畜不在少数。新疆省每年被狼伤害的牲畜就达10万—20万头。为了保证牲畜的安全,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号召牧民通过挖地窖、修圈舍、打狼群来保证牧畜的成活率。青海省同仁县牧民广泛挖地窖,保护羔羊。宁夏省提倡人畜分居,教育群众讲究圈舍卫生,只1952年,就利用旧木料、废砖瓦或补助贷款筑造圈棚18966个。^④同年,新疆牧业区搭圈棚47400多个;青海牧业区14个县搭盖圈棚共5357个。^⑤据统计,1952年,西北各地共搭建圈棚98630个。^⑥

在打击野兽方面,1952年1—10月,新疆迪化、景化、昌吉、和靖、托里等地牧民打狼960只。同年宁夏省组织了280个打狼队,共打狼942只、豹子59只。阿拉善连妇女、喇嘛也参加了打狼队,涌现出不少打狼英雄。^⑦青海牧业区3个县年打狼240多只。^⑧至1953年,青海全省打狼2269只;新疆各地也有打狼小组873个,参加打狼的群众15900多人,打死大小狼6590只、其他野兽14200多只、毒蛇121000余条。由于狼害的大大减少,在扭转许多牧民认为狼是“佛爷的狗”“愈打愈多”迷信思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保畜增殖也起了很大作用。

(七)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

西北地区有些草原,因缺乏水源,牲畜无处饮水,以致无法充分利用。解放前,“青海环海区共和县境内之洽不洽,南北长七十里,东西宽三十至四十里,面积约二一零零至二八零零平方里,洽不洽以东的朵海滩草原及多龙沟草原,面积共约一五零零平方里,均因缺乏水源,虽有相当丰茂之草,但不能放牧牲畜”。^⑨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号召在西北地区牧草丰美而饮水缺乏的草原上,开展打井、修渠、挖泉、挖水窖、打涝地等工作。

至1951年,“甘、宁、青、新四省,共恢复和扩充灌溉面积三百六十余万亩,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区。计新疆整修、新修渠道共可增加灌溉面积一百二十七万亩,青海扩大灌溉面积四万余亩,甘肃扩大灌溉面积二十一万六千余亩,宁夏整理增修大小水利工程二千零六十八处。”^⑩如果以1949年农田灌溉面积为100的话,新疆作为一个“有水就有地,无水即无田”的地区,“一九五〇年已为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二;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一百十二点三;一九五二年则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九。”^⑪1952年“宁夏一省就在草原上打井五百九十一眼、水窖七百一十二个,涝地一百九十二个”,使大部分牲畜都有足够的水喝。青海省则在草原上试打“洋井”,甘肃省永昌县在试打“洋井”失败后,在大黄山挖泉1个,增加了3000多只羊的饮水量。^⑫

①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②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③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④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⑤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43页。

⑥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⑦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⑧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44页。

⑨ 赵增荣:《西北草原破坏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北农林》1950年第1期。

⑩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第55—56页。

⑪ 青沙:《我国少数民族建设的新成就》,《经济周报》1954年第27期。

⑫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由于凿井、开渠,灌溉面积扩大,使广大牧区的许多“死草原”变成了“活草原”。

(八)改善交通,拓展贸易

历史上的西北地区一直交通不便,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牧区贸易不畅。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交通建设。公路建设主要是以恢复干线为主,并适当整修新路。1950年完成了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线全长500公里的修复工程及西宁至张掖公路167公里,新藏公路完成196公里的工程。^①此外,恢复了临夏到郎木寺、静宁到西海固、临洮中堡到临夏、永登到天祝、西宁到玉树、西宁到贵德等公路线,^②并以天(水)兰(州)铁路和兰新铁路为干线,组成一个运输网。同时,在铁路沿线设立屠宰场和牛马转运站,便于鲜肉外销和役畜外运。

为适应牧区内部交通不便的特点,西北军政委员会又在甘、宁、青、新各省建立了固定机构开展国营贸易,派遣流动贸易小组深入牧区,收购牧民的畜牧土特产品。贸易公司所到之处,备受少数民族的欢迎与爱护,他们对贸易公司充满了信任和感激。“青海夏卜让、贡麻两部落的牧民,在朵巴生的组织下,自动成立了自卫队帮助公司放哨站岗,保护物资,并要求公司先把他们的羊毛带走,以后再付粮食”。宁夏额济纳旗贸易小组到达牧区时,当地牧民争先恐后出售皮毛,选购货物,他们到处传说:“贸易公司到了,我们就方便了,买什么,有什么”。^③中断了多年贸易的青海果洛区,宁夏的额济纳旗、阿拉善旗,甘肃的肃北,新疆的蒲犁区也都得到了恢复。

据统计,“1950年1至8月西北国营贸易区内外运输的物资已超过1949年全年的50%以上”。^④以羊毛为例,“1950年拉卜楞一地就销出羊毛一百八十五万斤,超过抗日战争前每年平均输出额的24%,1951年羊毛销出更增加到二百二十六万斤”。^⑤1951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式上,习仲勋又再次强调运销土产的重要性,他说:“组织土产的运销,是目前振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今年上半年内,应由财经委员会召开一次专门研究运销土产的会议,吸收各省、市工、商、贸易部门的负责干部及工商界代表参加,研究出运销土产的切实计划和具体办法。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同样开一次土产会议”。^⑥到了1952年,青海国营贸易公司共收购各种畜皮“一百零五万零二百二十八张,肠衣六十八万三千六百条。新疆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各种畜毛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斤,各种畜皮一百八十六万六千零五十张”。^⑦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每集的交易额也开始显著提高,“甘肃东乡自治区锁南坝贸易公司每集的平均交易额1951年10月为二百万元,同年年底增至一千二百万元”。在畜产品打开销路的同时,国营贸易又合理提高了畜产品价格。与解放前相比,羊毛价格提高了6倍半至48倍。^⑧

三、取得的成效

西北军政委员会在其存在的短暂三年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保护和发展西北畜牧业”的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慎重稳进”的民族政策,并在部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妥善解决了民族纠纷,使畜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区,在1950年自治区成立时,全区有六万六千只羊,经过两年的努力,羊就增加到十三万八千多只了,肃北蒙族自治区从1950到1953年,该区的牛、马、羊、骆驼等牲畜由五千多头增加到了五万九千多头”。^⑨

①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第37页。

②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36页。

③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1页。

④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0页。

⑤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⑥ 《一九五一年新西北的四大任务》,第68页。

⑦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34页。

⑧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0页。

⑨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34—44页。

(一) 牲畜数量持续增长,畜产品稳定增加

在兽疫防治方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使数年便暴发一次的牲畜传染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仅以牛瘟而论,“1950年为41县的大流行,1951年已缩减至21县的散发,1952年则仅有7县报告疫情”。^①炭疽的危害也大大减小,其他羊痘、出血性败血病以及可疑的羊猝疽、肠毒血病、髓样肾病等,也都得到了控制。到1953年底,“青海省防治了一百五十多万头牲畜的疫病,新疆省五年来防治七百余万头牲畜的疫病,超过了两省牲畜总头数的五分之一,如果和解放前比较,则超过了过去九年中西北全区防治牲畜疫病累计头数的百分之十五”。^②

由于各地群众经过思想教育改善了饲养管理,牲畜的繁殖率和死亡率较往年已有显著变化。宁夏省1951年死亡率为6.04%,1952年降低为1.81%。^③流产率由3.42%降低至1.8%,羔羊成活率由87.3%增加到91.6%,40天的羔羊平均体重由7.5斤增加到10斤。1952年春季宁夏省羔羊繁殖率平均达50%,青海省两年来羊、牛、马、骆驼4种牲畜平均增加了17.1%。^④

死亡率下降,繁殖率上升,使牲畜的数量也得以持续增长。如以牲畜头数计算,“青海省解放后的三年中增加了20%。新疆省解放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8%”。^⑤“如果将抗日战争前,1937年牲畜发展的最高数字作为一百,那么到1952年后半年马、牛、驴等牲畜已发展为126.5%;山羊为116.7%;绵羊恢复到84.05%(如与1949年比较,仍超过了23.5%);猪为147.7%”。^⑥

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畜产品产量也开始稳定增加,至1952年甘肃、陕西、青海、宁夏等省的羊毛产量已超过1933年产量10%,^⑦其他如皮张、肠衣、猪鬃等产量也都大大提高。

(二) 牧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积极性加强

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西北地区广大牧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改善。“青海省贵德藏民道吉娃全家五口人,解放前最多一年买三封茶,吃青稞九百斤,冬夏都是穿一身老羊皮,解放后全家已缝斜布棉袍物件,衬衣十二件,裤子两件,每年喝茯茶九封,并且吃到了大米、挂面,又买了新锅四口,磁碗二十一个”。^⑧1951年,拉卜楞藏民“从市场买回呢绒、绸缎、布疋等共约一万八千疋,面粉四十余万斤,”^⑨牧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巴颜喀拉山里的曲麻菜,“五千个藏族牧民中有80%的人穿上了新布衣,60%的人吃上了青稞,60%的人吃上了挂面,10%的人吃上了大米,人人都能喝上茯茶。甘肃、青海、新疆三省边境上的3000多哈萨克族人民,过了十多年的流浪生活,没有牛羊,没有帐篷。现在他们安了家,有了大群牛羊,而且还有八十多架手摇缝纫机,大部分人都穿上了哈萨克人喜爱的修绒布衣,家家吃上了面粉,喝上了奶茶。冬天来了,他们穿的皮袄也挂上了布面子”。^⑩1952年,宁夏阿拉善旗科白尔巴格蒙民,马喜别利哥的粮食消费已较解放前增加了20%,茶叶、肉类增加了30%,油增加了70%。^⑪新疆省乌恰县柯尔克孜族的牧民,他们聚居在帕米尔高原的边缘上,解放前“全县只剩了一万一千多人,八万多头牲畜;解放

①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②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48—49页。

③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④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⑤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第23页。

⑥ 马明方:《西北畜牧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西北区畜牧会议上的讲话》,《群众日报》1953年5月4日。

⑦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78页。

⑧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0页。

⑨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⑩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73—74页。

⑪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0页。

后两年多,全县大小牲畜已增加到十五万五千九百多头,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了面粉”。^①

经济生活的改善,提高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青海省贵德县豆亥陋村藏民索木札喜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干部的帮助下,认识到了储草的好处。^② 以前从不注意清理绒毛杂质的牧民说:“今年我的毛没抖好,明年再卖驼毛时,保证全部好好的抖一遍”。^③

(三)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巩固了新生政权

1950年,西北地区年产羊毛4800多万斤,各种皮子822万张,肠衣530多万根,猪鬃459千斤,驼毛100多万斤。^④ 这些畜牧业产品在国内占有极高的份额,仅以羊毛而论,西北地区所产羊毛就占全国总产量70%以上。这些珍贵的畜产品不仅是新中国初期我国毛纺织业、皮革工业和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材料,而且也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新疆为例,新疆省向苏联输出的各项物资总值中,畜产品占90%左右。1950年到1953年,仅新疆出口到苏联的羊毛、皮张、肠衣等畜产品,就可以为国家换回12300多辆载重汽车和4164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⑤ 显然,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产品是当时支援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西北畜牧业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新生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在经略过程中,面临着机构不健全、经验缺乏所导致的行动迟缓、宣传工作不及时等问题。如1950年,甘肃“畜牧兽医计划尚未得到畜牧部的具体肯定而明确的指示,在工作的推动上好像没有依据,不免有些左顾右盼的现象。一些机构没有确定,如家畜改进处和兽医防治处的业务范围大多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因此在推动业务上存在着大也不好、小也不好的感觉。人事没有确定,因此干部不安心工作,不去抢功,虽然每个单位都有组织派去的同志,但总感觉工作缺乏一个主力”。^⑥ 在这样人事浮动的情况下,导致某些地区的分配经费超过实际需要,陇西县分配400万元,实际仅开支1087850元。^⑦ 1951年6月,甘肃永靖县发生炭疽,保畜机构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老乡刘世信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死羊59只、耕畜5头,并传染了5个小孩。1952年“青海湟源县牧民对于人工授精不相信,影响了绵羊杂交推广工作”。^⑧

即便存在一些不足,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积极努力和助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畜牧发展计划制定并付诸实施,西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依然得以充分发挥,牲畜增殖,品质改进,使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牧区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普遍提高的同时,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也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巩固。

Managing on Animal Husbandry in Northwest China of the Northwest Chin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in the Early New China

Li Xiaoying Wu Bin

Abstract: In the early new China, for facing the recession of animal husbandry in northwest China, the Northwest Chin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which are under the

① 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正在积极发展和改进中的西北畜牧业》,《科学通报》1952年第10期。

②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③ 《祖国西北地区三年来的伟大成就》,第102页。

④ 柳超:《西北畜牧业》,第12页。

⑤ 赵增荣:《西北草原破坏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北农林》1950年第1期。

⑥ 《畜牧兽医事业调查计划纲要》,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01—0001。

⑦ 《补充发放经费使用办法》,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22—002—0052—0016。

⑧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一九五二年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3年第1期。

policy of “to protect and develop animal husbandry, and to prevent the plague” of central government, to develop it. The activ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Northwest Chin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Northwest China, but also improve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pastoral areas. In the meanwhile, it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merging people’s democratic regime.

Key Words: The Northwest Chin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The Early New China; Animal Husbandry in Northwest China

(责任编辑:黄英伟)

2017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7 年 3 月 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2017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致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海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北京大学萧国亮教授等 40 多家单位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深入讨论了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

会议回顾与总结了 2016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成果。董志凯对从 8 个方面对 2016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总结。赵学军回顾了 2016 年当代中国金融研究动态。郭旭红、武力对当代中国产业问题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彤新春对 2016 年交通业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隋福民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进行了探讨。杨德才对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宋士云认为新中国 60 多年的劳动经济史,是一部从改革开放前的“生存”到改革开放后“生活”的蜕变史。李占才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结构维度,解析了什么是小康社会形态。王瑞芳回顾、总结了 2016 年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状况。曲韵对 2016 年对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朱高林对我国居民消费若干问题研究做了述评。于文浩对 2016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行了梳理。

会议讨论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武力指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根基和源头就是中国经济史,要不断开拓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以适应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朱恒鹏介绍了开展中外公立医院比较研究案例,强调了搞清楚研究对象基本史实的重要性。苏少之、秦晖认为了解数据背后的历史才能对数据做正确的解读。汪海波就中国经济史研究怎样落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谈了几点体会。萧国亮指出好的研究方法可借鉴,但都不能照抄照搬。赵德馨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战略发展始终高度关注,并委托邹进文和易棉阳向大会转达了对于学科战略发展的思考。易棉阳认为破解经济史学危机的有效办法就是重新调整学科定位。郑有贵强调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都有其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该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于供给侧改革的理

与会学者还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作了展望。(朱海城)